東亞觀念史集刊　第二十一期
2023年9月　　頁403-418
DOI: 10.29425/JHIEA.202309_(21).0010

創造「歷史記憶」：

《中國學生周報》的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的論述意識研究*

Creating "Historical Memory":

A Study on the Discourse Consciousness of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Chinese Student Weekly*

龐浩賢**

Hoyin Pong

---

* 本文部分內容為筆者的碩士學位論文——龐浩賢：《負起時代責任：《中國學生周報》與「文化中國」在香港之建構》（香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20年）改寫而成。

** 作者現為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哲學博士生。

一、《中國學生周報》與「歷史記憶」

《中國學生周報》（以下簡稱為《周報》）隸屬於友聯研究所。友聯研究所由一群反共而南來香港的中國文化人所創立，自1950年代起，友聯研究所一直進行中國大陸政治社會發展的研究以及出版關於中國大陸當代政治發展的雜誌及書籍，包括《中共國民經濟財政計劃體系與工業財務計劃》（1966）、《中共節育運動》（1967）、《文革下的中共經濟》（1968）、《文革後的中共經濟》（1974）等專書。[1] 除了《周報》外，友聯亦曾出版兒童刊物《兒童樂園》（1953-1995）及政論雜誌《祖國週刊》（1953-1963）。同時，友聯研究所一直接受美國「亞洲基金會」（Asian Foundation）[2] 的資金援助其業務發展，[3] 近年更有研究指出「亞洲基金會」與美國中央情報局（CIA）關係密切，[4] 因此學界大多視友聯研究所以及其生產的刊物為「美元文化」[5]

---

1 盧瑋鑾、熊志琴編著：《香港文化眾聲道1》（香港：三聯書店，2016年），頁14-16。

2 Shuang Shen, "Empire of Information: The Asia Foundations Network and Chinese-Language Cultural Production i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American Quarterly* 69, no. 3 (September 2017): 589-610.

3 馮品佳：《通識人文十一講》（臺北：麥田出版，2004年），頁166-167。

4 王梅香翻查2019年解密的美國政府檔案，證實「亞洲基金會」的收入來源並非單純依靠民間捐助，美國國務院及中央情報局亦透過美國新聞局資助「亞洲基金會」的日常經費，故「亞洲基金會」可被視為具有美國官方背景的政治組織。「亞洲基金會」在冷戰時期亦一直與美國國務院及美國新聞處緊密合作，向東南亞及海外華人進行「文化宣傳」及「教育經營」，成為了「自由價值捍衛者」的象徵，並作為美國政府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價值的「傳播者」。參考王梅香：〈冷戰時期非政府組織的中介與介入：自由亞洲協會、亞洲基金會的東南亞文化宣傳（1951-1959）〉，《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32卷第1期（2020年3月），頁127-130。

5 又稱為「美援文化」或「綠背文化」，泛指冷戰時期香港及臺灣地區接受美國官方資助的文化及傳媒機構，被視為傳播美國官方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參考趙稀方：〈民族主義與殖民主義——友聯及《中國學生周報》的思想悖論〉，《社會科學輯刊》2017年第4期，頁165-171。

的產物。[6] 許維賢形容在美國資助下成立的友聯出版體系引領並建構了冷戰時期「港臺－東南亞的華語文學文化之生產」，並「使之與中共文學文化脫勾和決裂」，打造了「自由世界」論述。[7]

曾任《周報》創刊總編輯的著名學者余英時（1930-2021）形容友聯的出版刊物對當代香港社會文化特別是對青年思想有重大貢獻，他指出：

> 對青年人的價值觀念產生了一代的啟蒙作用。通過相關的刊物，友聯深入淺出地把中國重視人文的觀念如仁義禮智信和現代普世價值如民主、自由人權等傳佈到青年學生的心中，並且長期不斷地進行下去，其效果是難以估量。[8]

因此，由國共內戰後南遷香港的一群中國文化人所創辦並接受美援資助的重要青年文化雜誌《周報》，[9] 在其書寫歷史事件的時候，往往會隱含著當代的反共政治意識形態，藉以向廣大的香港青年讀者們進行灌輸。[10] 傅葆石認為《周報》的「工作目標」正是「試圖

---

6 根據傅葆石翻查「亞洲基金會」的檔案資料，發現《周報》得到「亞洲基金會」財政支援的原因，就是「支援中國青年流亡知識分子，喚醒流亡學生對祖國的責任感及國際民主鬥爭的意識」，並資助友聯研究所創辦《周報》，從中吸納流亡香港的青年學生們參與編輯工作。參考傅葆石：〈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1950-1970（上）〉，《二十一世紀》第173期（2019年6月），頁47-62。

7 許維賢：〈亞洲基金會在新馬的文化冷戰：以友聯出版社和《學生周報》為例〉，《中外文學》第52卷第4期（2023年6月），頁105。

8 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臺北：允晨文化，2018年），頁140。

9 根據曾任《周報》社長的陳特（1933-2002）記述，《周報》高峰的銷售時期曾每期售出超過三萬份，相比起當時同類型的青年刊物如《青年樂園》的每期約一萬份的銷量，反映了《周報》的流行程度。參考龐浩賢：〈建構香港青年的「中國人」民族身份認同：以冷戰初期《中國學生周報》的傳統中國文化知識宣傳工作為研究中心〉，《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18期（2021年4月），頁140。

10 龐浩賢：〈1950-1970年代中華民國視野下的亞洲：以《中國學生周報》為

將《周報》打為一種淡化政治色彩的文化啟蒙媒介，聯合世界各地的華人青年，凝聚成一股重塑中國的力量」。[11] 一方面，《周報》在強調「中國人」身分認同意識的同一時間，更是強調建構一種具有「反共」意識的「中國人」政治及身分認同。《周報》透過傳統文化和歷史知識建構當代香港青年的「中國人」身分認同意識，更可能把傳統中國文化視作為抗衡共產主義在香港以至東南亞華人社群中不斷擴展的意識形態「工具」，並配合美國官方以至臺灣國民黨政權在「文化冷戰」鬥爭場域中透過傳統中國文化藉以抗衡共產主義不斷傳播擴張的意義，建構著一種強調「反共意識形態」的「中國人」身分認同意識。[12]

本文將會透過《周報》上有關於中國1911年辛亥革命和1919年五四運動的「紀念文章」，分析《周報》如何透過書寫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歷史記憶」，從而把兩場歷史事件的民族主義意識轉化成為反共政治意識，並扣連成為中國人身分的義務責任。透過分析和綜合《周報》文章當中關於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文章，就能夠清晰理解和呈現出《周報》把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這兩件發生於中共尚未成立時的歷史事件與反共政治意識形態互相扣連，鼓吹當代青年人必須承擔起「中國人」身分認同意識的「義務責任」，並從這兩件歷史事件中學習為民族、國家貢獻的精神價值，繼而參與當代的反共運動之中，以切合《周報》的政治意識形態主張，形成一種反共的「歷史記憶」。

研究中心〉，《思與言》第58卷第2期（2020年12月），頁45-74。

11 傅葆石：〈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1950-1970（下）〉，《二十一世紀》第174期（2019年8月），頁67。

12 龐浩賢：〈建構香港青年的「中國人」民族身份認同：以冷戰初期《中國學生周報》的傳統中國文化知識宣傳工作為研究中心〉，頁138。

二、歷史記憶與身分認同

學者 Barry Schwartz 指出記憶的意義從來都是為了當代的觀念及認同所服務而產生，與強調真實考證的歷史在性質上並不相符。[13] 法國學者諾拉（Pierre Nora）認為記憶和歷史存在著根本對立的狀態和關係，他指出「記憶是一種永恆的現實現象，是將我們與永恆的當下聯繫在一起的紐帶；歷史是過去的代表，是一種知識和世俗的產物，需要分析和批評」。[14] 歷史學者 Davis 和 Starn 也認同歷史和記憶之間存在的張力或直接衝突是必然存在的。[15] 可見，記憶和歷史在呈現「過去」存在本質上的差別。

另一方面，歷史記憶（historical memory）這個概念源自於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而衍生出來。集體記憶概念由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提出，他指出「過去」並非客觀地構成，而是由人們集體地建構出來，因此人們如何論述過去，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當下的意識、利益。[16] 廖宜方指出「歷史記憶」的研究源自社會科學及人類學的記憶研究，「歷史記憶」與「歷史意識」等概念有著相似的思想研究脈絡。[17] 歷史人類學者王明珂則強調近代學術研究裡往往把「歷史」視為社會記憶（social memory），由社群中的人們透過選擇、組織、編寫「適當的過去」，作為該社群成員間的共同「集體記憶」，作為凝聚該社群身

---

[13] Barry Schwartz, “The Social Context of Commemoration: A Study in Collective Memory,” *Social Forces* 61, no. 2 (December 1982): 374-402.

[14] Pierre Nora,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Spring 1989): 7-24.

[15] Natalie Zenobia Davis and Randolph Starn, “Introduction,” *Representations* 26 (Spring 1989): 1-6.

[16]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trans. Lewis A. Cos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62-64.

[17] 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年），頁3-6。

分認同意識的「記憶架構」，強化成員之間的社會認同。[18] 潘宗億指出歷史記憶指涉個人或社群於「現在」對選擇性之特定「過去」所共享的意義認知，而此一意義認知乃由所屬社群所形塑造成。[19] 王汎森則認為近代社會中出現不同層次的「歷史記憶」及「歷史知識」，不同的「歷史記憶」之間存在一種「競合關係」，受到不同的政治意識和政治認同所影響而產生出來。[20]

從《周報》裡對於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兩件對於近代中國政治發展非常重要的歷史事件的敘事和論述意識，印證「歷史記憶」如何按照當代社群的政治需要，被篩選、重塑而建構成為一種政治論述，用作維繫某社群成員的身分認同象徵。對《周報》而言，透過形塑和強調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兩件歷史事件的意義和論述中，蘊含著「愛國」、「反共」的政治意識形態，把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和「反共」意識形態扣連上關係，呼應和支持《周報》一直強調具有「反共」意識的「中國人」身分認同，並藉此向當代香港青年人傳遞著這種政治意識形態和身分認同意識。

三《中國學生周報》裡的辛亥革命「歷史記憶」論述

《周報》每年都會在辛亥革命（10 月 10 日）及五四運動（5 月 4 日）紀念日的前後期號裡設置「特輯」，向讀者公開徵集紀念辛亥革命及五四運動的文章。透過分析這些紀念徵文的內容，便會發現《周報》刊登的「紀念文章」均十分強調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對於香港青年人的當代意義，並強調學習兩場歷史事件所呈現的「民族精神價值」。

---

[18] 王明珂：〈臺灣青少年的社會歷史記憶〉，《歷史學報》第 25 期（1997 年 6 月），頁 149-182。

[19] 潘宗億：〈歷史記憶研究的理論、實踐與展望〉，收於蔣竹山主編：《當代歷史學新趨勢》（臺北：聯經出版，2019 年），頁 247-283。

[20] 王汎森：《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2020 年增訂版），頁 2。

這些徵文文章均認為從歷史價值而言，辛亥革命給予了當代香港年青人一種「效法前人」的意義價值，指引了當代青年人需要參考辛亥革命時期「反清義士」們不惜犧牲一切，推翻滿清政權的「愛國民族意識」。這些文章又呼籲香港青年人學習這種「愛國民族意識」。故此，《周報》所刊登的「紀念文章」對於辛亥革命及五四運動的歷史論述，成為了《周報》青年讀者們對於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事件的「歷史記憶」。而這「紀念文章」中所呈現的辛亥革命及五四運動精神價值，卻被刻意選取和強調當中的民族主義意識，再轉化為當代反共的政治意識，成為了《周報》視野下當代香港青年人承擔中國人身分認同的義務責任。

直至1960年代中期以前，《周報》的編輯們每年均會徵求慶賀辛亥革命週年的「紀念文章」。這些「紀念文章」的核心意識皆為圍繞著討論辛亥革命所呈現的民族、國家貢獻及犧牲的精神如何引導當代青年投身反共事業之中。《周報》創刊首年的「紀念文章」便指出當代香港青年人必須「珍惜」辛亥革命所創造的價值，即為「全國人民的普遍覺醒和民主意識在民間的生根」，藉以思考如何面對「中共統治大陸以來，中國學生所遭受的毒害、奴役、蒙蔽和控制」。[21] 而《周報》另一篇紀念辛亥革命的文章〈我們要化悲憤為力量——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國慶獻詞〉亦指出「辛亥革命是中華民族的無比光彩，值得後世青年引以為榮」，作者更呼籲當代青年不要浪費革命先烈建立的「民主中國旗幟」，繼承「優良的革命傳統，驅逐俄帝，重建民國，讓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永遠飄揚在祖國天空上」。[22] 故此，《周報》的文章在書寫辛亥革命的「歷史記憶」時，非常強調當代的香港青年如何汲取辛亥革命所呈現的愛國民族意識並投放於當代的中國政局當中。

---

[21] 學壇：〈且看明年今日　中華民國四十一年國慶獻詞〉，《中國學生周報》第12期第1版，1952年10月10日。

[22] 學壇：〈我們要化悲憤為力量——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國慶獻詞〉，《中國學生周報》第64期第1版，1953年10月9日。

更進一步地分析這些文章所書寫的辛亥革命論述，便會發現《周報》所刊登的文章最著重於描述辛亥革命為一段「熱血的民族歷史」，前人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而推翻滿清的「暴政」，藉此強調中國身分認同的責任。並強調每一個香港青年人都有為國家民族貢獻犧牲的責任，並把這種「身分責任」意識轉化成為當代的反共政治意識，呼籲香港青年人堅持推翻中共政權的意識。故此每年《周報》所刊登的紀念文章均反覆表述「推翻當代中共暴政」的論述意識。題為〈雙十感言〉的文章感嘆道：「我們是中華的兒女，既不能忍受滿清的專制，難道卻能容忍共黨更殘酷的宰割嗎？」該文繼而呼籲讀者「只要我們能效法先烈的大無畏精神，定能打倒赤色漢奸」，作者要求讀者們應該效法辛亥革命的先賢般，為了國家民族利益而投身當代的反共運動。[23]

另有題為〈重書中國抗暴史——寫在中華民國四十三年國慶之前〉的文章形容「四十三年後的今天，中國的血性男兒又正在動筆。讓我們恢復辛亥革命時代的開創氣象，重寫中國的抗暴史吧」。[24] 該文作者呼籲讀者們在當代的香港社會裡仍然要繼承辛亥革命的抗暴精神，並把中共政權視作為當今的「滿清暴政」。另一篇名為〈不是為了「自我安慰」〉的文章強調國慶日的意義「就是透過紀念先烈們締造民國的艱鉅，醒覺到我們這一代的任務」，文章最後則指出當代香港青年人繼承前人革命精神的最佳方法就是堅持反共的政治意識。[25]

《周報》的論述更強調年青人需要繼承辛亥革命意識的責任。《周報》一篇名為〈慶祝國慶．默禱中華的復生〉的文章，該文形

[23] 惠忠：〈雙十感言〉，《中國學生周報》第64期第6版，1953年10月9日。
[24] 學壇：〈重書中國抗暴史——寫在中華民國四十三年國慶之前〉，《中國學生周報》第116期第1版，1954年10月8日。
[25] 魯文：〈不是為了「自我安慰」〉，《中國學生周報》第221期第5版，1956年10月12日。

容「現在海外青年應該繼承辛亥革命，各人在自己的地位紮好根基，愛我們錦繡壯麗的山河」；[26] 另一篇文章則指出「青年人是國家的主人翁，是推進社會原動力，國難當頭，同胞的榮辱，是全付託於我們的身上，傳承革命遺志」；[27] 這些論述指出青年人更需要負起繼承辛亥革命的「歷史責任」。

更重要的是，不少《周報》的紀念辛亥革命的文章更強調香港及海外的華人青年們必須繼承前人參與辛亥革命以拯救中國的愛國精神，並轉化為推翻當前的中共政權以拯救中國。另一篇文章則指「青年人是國家的主人翁，是推進社會原動力」，因此當時的「國難當頭，同胞的榮辱，是全付託於我們的身上，傳承革命遺志」，該文章強調香港的青年人需要肩負起「辛亥革命的遺志」，推動當代的反共抗暴運動。[28] 綜合分析《周報》所刊登的辛亥革命「紀念文章」，這些文章的核心意識均強調當代的香港青年人更需要繼承前人在辛亥革命這個「歷史記憶」事件當中為中國犧牲的民族主義意識，並轉化成為冷戰時期的反共政治意識。

四、《中國學生周報》裡五四運動的「歷史記憶」論述

另一方面，每年四月底至五月初，《周報》都有刊登有關於「五四運動」的文章。每當這些紀念「五四運動」的文章論及五四運動的精神價值時，往往把重點強調為當代的中國青年們愛國民族主義運動。包括不滿當時的軍閥政權簽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26] 學壇：〈慶祝國慶．默禱中華的復生〉，《中國學生周報》第586期第3版，1963年10月11日。
[27] 國子：〈責無旁貸〉，《中國學生周報》第638期第3版，1964年10月9日。
[28] 陳美華：〈反省一下　雙十節感言〉，《中國學生周報》第1107期第6版，1973年10月5日。

並強調五四運動是由一群愛國學生所發起的「愛國運動」，並讚揚當中呈現出「愛國」、「救亡」等具民族主義意識的精神價值。一篇名為〈紀念山洪爆發的一天〉的「紀念文章」形容五四運動為「青年學生們在愛國熱情的鼓舞下，掀起了這波瀾壯闊、石破天驚的運動」。[29] 另一篇文章更直接形容五四運動是中國的「啟蒙運動」，該文作者強調「五四運動所表徵的是當時民族知識份子開始創導我國的啟蒙運動」。[30] 而《周報》裡另一篇文章亦指出「直到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北京大學的學生發起之下，一個全國性的、反對當權軍閥喪權辱國的愛國運動興起了」。[31] 可見，《周報》所刊登的文章認為五四運動是一場由當代中國青年民族主義者所發起的「愛國運動」，並強調五四運動當中的愛國民族主義意識。

同時，《周報》所刊登的「紀念五四」文章要求當代的香港青年人必須學習及繼承五四青年一代的「愛國精神」。題為〈重創五四精神〉的文章指出五四運動是一場「前人給予我們很好的例子作為喚醒民族精神的運動」，並藉此質問為何當代香港青年人並沒有繼承五四精神，作者批評「為何香港的年青人不能像前人般轟轟烈烈的奮發一番投入民族啟蒙運動？」最後該文作者要求當代的香港青年人學習及繼承五四青年的「民族精神」，並思考如何在現世的中國政局中實踐起來。[32]

可是，究竟《周報》希望當代香港的青年人應該如何在當代香港社會中實踐五四精神？其實，《周報》期望香港青年人所學習的五四精神，就是一種為國家利益做貢獻、犧牲的民族主義精神，並

[29] 學壇：〈紀念山洪爆發的一天〉，《中國學生周報》第250期第2版，1957年5月3日。

[30] 學壇：〈五四課題的重提〉，《中國學生周報》第511期第2版，1962年5月4日。

[31] 平：〈民主的實踐——「五四」五十周年紀念會側記〉，《中國學生周報》第877期第1版，1969年5月9日。

[32] 懷國：〈重創五四精神〉，《中國學生周報》第668期第3版，1965年5月7日。

且把這種民族主義精神轉化成為當代的反共政治意識。《周報》上一篇名為〈要把「五四」復活〉的文章認為中共的統治令五四運動的核心精神「黯然失色」，該文章指出「五四運動是以愛國為出發點，但是今日中共偏要實行一面倒的賣國政策，五四運動的精神是打倒權威，但是今日中共卻要掉轉頭來建立權威，實行專政」，故此作者呼籲「我們這一代的中國青年要拿出魄力，使五四復活。再掀起一個新文化運動」。作者呼籲香港青年從五四青年身上學習愛國民族意識，並轉化為當代反共的政治意識形態，繼而發動一場「新文化運動」以推翻中共政權。[33]

再者，題為〈發揚五四精神〉的文章則指出紀念五四運動的最好方法，就是推翻中共統治。該文章認為「海外的中國知識份子應承擔這個責任」，就是「要深刻認識共產主義與五四精神是水火不相容的，並且設法摧毀中共的極權統治」。[34] 也有另一篇文章提出相似的論述，該文作者認為只要當代的香港青年能夠繼承五四精神，願意為國家民族的發展作出貢獻，就能夠推翻中共的統治。該文形容「今天中共的極權統治造成了中國人民空前的災難」，但只要中國的青年同學們「繼承五四精神，堅持民主理念」，最後中國「終將掙脫極權統治的枷鎖，並解除中華民族的苦難」。[35] 秋貞理（即司馬長風，1925-1980）[36] 在名為〈五四運動與中國青年〉的文章中透

[33] 學壇：〈要把「五四」復活〉，《中國學生周報》第41期第1版，1953年5月1日。

[34] 學壇：〈發揚五四精神〉，《中國學生周報》第877期第3版，1969年5月9日。

[35] 學壇：〈五四與當代青年〉，《中國學生周報》第94期第1版，1954年5月7日。

[36] 司馬長風原名胡若谷，生於1925年遼寧省瀋陽市，曾任中華民國國民大會代表，輾轉流亡香港，為《周報》母公司友聯研究所的共同創辦人之一。司馬長風使用多個筆名撰寫討論中國政治及文學的書籍，包括《中國民主之路》、《明天的中國》、《中國新文學史》等等。在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初，司馬長風在《周報》以筆名秋貞理撰寫「生活與思想」的專欄文章。

過紀念五四運動的精神來呼召大陸及海外的中國青年們共同反共，該文認為「由於五四青年的勇烈犧牲，已散播下了億萬不可滅的反抗火種，正在此起彼落的撼搖著中共的血污政權」。[37] 可見《周報》所刊登的「紀念五四」文章均一致強調以反共的政治意識作為實踐當代的五四精神意識，把五四運動的精神價值轉化成為當代的反共政治意識，並呼籲當代的香港青年人肩負起反共的精神價值。

同時，《周報》在論述五四運動時，亦都只是強調五四運動是由一群愛國學生所發起，而忽視了一般主流論述認為五四運動是追求民主及科學的價值、反傳統中國文化的意識、要求西化等主張，只強調五四運動裡強調「救亡」中國的民族意識；[38] 另一方面《周報》把五四運動與反共意識扣連上關係，認為當代中國人應該吸取五四運動的愛國情意，把這些民族情緒轉化作為「反共」的政治論述和動力。誠如葉蔭聰的分析，《周報》呈現了一種「奇特的五四論述」，葉指出：「對《周報》來說，五四運動是透過民族想像成為『新文化運動』，一個現代中國文化民族的里程碑及『啟蒙的開始』。總括而言，五四引伸的並非反帝鬥爭而是復興中國文化及反共。」[39] 可見《周報》的論述把「五四精神」嫁接往反共的意識形態裡。

總括分析《周報》所刊登的紀念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文章，本文發現《周報》所書寫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歷史記憶」，經過「篩選」及「轉化」，巧妙地建構並強調這兩場近代中國歷史上的大事件對於當代香港青年人的核心意義，成為學習歷史前人願意為國家民族利益而犧牲貢獻的「愛國民族主義意識」，並且把這股「愛國民族主義意

[37] 秋貞理：〈五四運動與中國青年〉，《中國學生周報》第407期第2版，1960年5月6日。

[38] 周策縱：《周策縱文集》上（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332-341。

[39] 葉蔭聰：〈「本地人」從哪裡來？《從中國學生周報》看六十年代的香港想像〉，收於羅永生主編：《誰的城市？戰後香港公民文化及政治論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3-36。

識」轉化成為當代的反共政治意識形態，而這種反共政治意識形態亦成為了《周報》提倡的當代「中國人」身分認同附帶的義務責任。

五、「歷史記憶」中的「政治意識」

總括而言，《周報》透過重塑辛亥革命及五四運動的「歷史記憶」，向讀者及社會大眾傳遞反共的政治意識。羅永生形容：

> （作者按：《周報》）在印行的頭二十年裡，它也跟其他反共刊物一樣，炮製了同樣多的冷戰修辭，把共產中國列為徹頭徹尾的「他者」，抨擊中共在大陸的執政……。[40]

《周報》所刊登的「紀念文章」透過書寫辛亥革命以及五四運動這兩場近代中國歷史裡的重大事件，並「提煉」這兩場歷史大事件當中的民族主義意識及情緒，成為當代冷戰青年人們必需學習的精神價值；繼而不斷反覆強調，把辛亥革命及五四運動所呈現的民族主義意識及情緒扣連往中國人身分認同意識當中，指出這兩場歷史大事件就是中國人身分認同意識的重要象徵符號，並呼籲當代香港的青年人透過學習和感受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歷史精神，建構自身的「中國人」身分認同意識。

再者，《周報》所書寫並建構的辛亥革命論述，猶如王明珂分析國民黨政權一直以來把辛亥革命的「歷史象徵意義」塑造成為「中華民國」國民的「共同起源」的歷史論述般類同。王明珂指出「辛亥革命被一群人根基化為共同起源，用來強化彼此的假血緣聯繫以增進群體的凝聚」，[41] 辛亥革命的歷史書寫成為了政權鞏固自身統治

---

[40] 羅永生：《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190。

[41]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1997 年），頁414。

合法性的工具。《周報》則是透過書寫其辛亥革命論述，把辛亥革命這場歷史事件的意義價值放置於當代的政治場域當中，並扣連上反共的政治意識形態，藉此宣揚反共思想。

《周報》文章書寫的五四運動論述則符合了舒衡哲（Vera Schwarcz）形容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及政黨經常透過論述自身對於五四運動的「歷史記憶」，把政治意識形態放置於其書寫的「歷史記憶」當中，並藉此「歷史記憶」來教育同胞，具有政治宣傳目的的說法。[42]《周報》則透過刊登每年紀念五四運動的文章，把反共的政治意識放置於五四運動的「歷史記憶」之中，強調當代香港的青年人必須學習和繼承五四運動所呈現的愛國民族主義意識，轉化並投身於當代的反共運動當中。可見，五四運動再次被論述成為近代中國的宣傳政治意識形態工具。

故此，《周報》透過書寫辛亥革命及五四運動的「歷史記憶」，向當代香港青年讀者們傳播反共的政治訊息，試圖驅使讀者們認同《周報》所主張和建構的具有「反共義務責任」的「中國人」身分意識。陳學然形容《周報》所刊登的「紀念五四」文章當中存在「隱含的政治意識」，這是一種「藉五四運動嚴厲批判共產中國的意識」，[43] 他又指出「《中國學生周報》存在藉著紀念五四運動鼓舞當代青年學生，並鼓勵學生向五四青年學習的論調」。[44]

葉蔭聰則形容《周報》產生了一種「奇特的五四論述」，他形容：

---

[42] Vera Sch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240-280.

[43] 陳學然：《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香港：中華書局，2014 年），頁 266。

[44] 陳學然：《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頁 266。

> 對《周報》來說，五四運動是透過民族想像成為「新文化運動」，一個現代中國文化民族的里程碑及「啟蒙的開始」。總括而言，五四引伸的並非反帝鬥爭而是復興中國文化及反共。[45]

可見，《周報》刊登的文章「選取」了辛亥革命及五四運動當中的愛國民族意識，並把其嫁接往當代的政治語境當中，強調當代的愛國精神便是持守反共的政治意識形態，把辛亥革命及五四運動的「歷史記憶」轉化成為反共的政治意識。

更重要的是，《周報》刻意建構和篩選的辛亥革命及五四運動的「歷史記憶」的行為。這種刻意建構和篩選歷史論述的行為，符合了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提出「歷史書寫是寫作的政治」的概念般，他形容歷史記錄的內容是受到不同政治勢力或黨派所「製造及發明」而產生出來，沒有絕對的真實性，按照當代現實政治需要才書寫而成。[46] 而《周報》則「製造及發明」了以反共政治意識作為其辛亥革命及五四運動的「歷史記憶」當中所反映的精神價值，並成為《周報》讀者群對於辛亥革命及五四運動兩件歷史事件的「歷史記憶」。《周報》所建構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歷史記憶」及論述，如同許維賢形容友聯的出版物，建構了港臺以及東南亞的華語文學文化網絡般，成為了塑造「自由世界」論述的一部分，結合《周報》在其他範疇包括文化、文學等方面的文本論述，成為了冷戰時期香港以至整個華文世界抗衡共產主義擴張的重要思想論述的資源及工具。

---

[45] 葉蔭聰：〈「本地人」從哪裡來？從《中國學生周報》看六十年代的香港想像〉，頁16。

[46] 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著，魏德驥、楊淳嫻譯：《歷史之名》（臺北：麥田出版，2014年），頁148-153。

德里克（Arif Dirlik，1940-2017）認為現代民族身分認同的建構過程是一場「內部殖民」（internal colonialism）的過程。他指出世界各國的民族主義者也會參考西方殖民者為自身殖民行為辯解的「白人的文明教化使命」論述，在形塑民族身分意識裡注入義務的條件，要求民族內成員需要「負起義務，必須對國家的抽象民族概念效忠、服務」，例如民族的苦難、責任等等，並要求人們獻身為民族利益奮鬥，以此作為民族身分認同的內涵。[47]《周報》所刊登的文章透過把當代的反共政治意識置入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這兩場具象徵性意義的近代中國歷史事件之中，加上《周報》歷年來刊登不少帶有反共政治意識的文章，《周報》藉此建構了特定的「中國人」身分認同意識，把反共的政治意識植入了《周報》定義下的「中國人」身分認同之中，成為這個「中國人」認同附帶的義務責任。

「歷史記憶」能夠被不同意識形態的人士「創造」、「論述」出來。持有不同政治意識形態的人們均會按照自身當前的政治需要而建構及宣傳其「歷史記憶」，以強化其意識形態立場的論述。《周報》為了宣傳其主張的反共意識形態和其建構的「中國人」身分認同，把發生於中共尚未成立時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這兩件歷史事件論述與反共意識形態扣連，鼓吹當代青年人必須從這兩件歷史事件中學習為民族、國家貢獻的「歷史記憶」，並進而參與當代的反共政治運動之中，以切合《周報》主張的當代政治意識形態，成為《周報》強調的「中國人」身分認同當中的「義務責任」。可見，「歷史記憶」場域為近代不同政治勢力鬥爭擴張的重要「戰場」，不同政治陣營均會「製造」及「建構」切合自身利益立場的「歷史記憶」論述，以支持其主張的政治論述意識。

---

[47] 德里克（Dirlik Arif）著，馮奕達譯：《殖民之後？臺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新北：衛城出版，2018 年），頁 89-90。